

引用格式：

孟盼盼, 范胜龙, 胡勇. 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代际效应的调节作用[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3): 000-000.

Meng P P, Fan S L, Hu Y. Research on the impacts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n the willingness of homestead exit: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generation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3): 000-000.

DOI: 10.13872/j.1000-0275.2023.0021



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代际效应的调节作用

孟盼盼¹, 范胜龙^{1*}, 胡勇²

(1.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 10083)

摘要: 引导农户自愿参与闲置宅基地退出是提高宅基地管理工作质量的有效途径, 城乡融合发展为其退出提供了驱动力。基于城乡融合发展和代际效应理论, 以福建省建瓯市为例, 利用实地调研数据, 分析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 并运用 Probit 模型、IV-Probit 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农户代际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 调研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明显, 65.77% 的农户愿意有偿退出闲置宅基地, 追求城市较好的就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为退出宅基地的主要诱因。人口融合、经济融合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 而土地融合、社会融合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负向抑制作用。村庄异质性分析表明, 人口融合发展对近郊型农户退出宅基地有显著促进作用。代际能调节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方向, 人口融合、经济融合发展正向提高了新生代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土地融合、社会融合发展反向抑制了老一代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因此, 为推进闲置宅基地退出工作, 提出了统筹管理城市住房指标与农村宅基地指标以优化宅基地管理制度, 推动宅基地改革成果转化为发展红利和治理实效, 提高农户城市融入能力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闲置宅基地; 宅基地退出; 农户意愿; 城乡融合发展; 代际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2023)00-0000-00

Research on the impacts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n the willingness of homestead exit: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generations

MENG Pan-pan¹, FAN Sheng-long¹, HU Yong²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2. College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83, China)

Abstract: Guiding farmers to voluntarily exit idle homestead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omestead management,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areas provides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exi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and applying survey data of Jianou city, Fujia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willingness to exit from idle homestead,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farmers' intergeneration on the homestead exit willingness by the Probit, the IV-Probit and the moderation models.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are more willing to exit homesteads, and 65.77% of farmers are willing to exchange the idle homesteads for a payment, and pursuit of better work conditions and public services in the city is the main incentive for them to give up their homesteads.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xit their homesteads, while the land and social integratio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suburban farmers' willingness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tion integration. Generation can regulate the influence direc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positively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of newer generation to quit homesteads, and the land and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s inhibit the exit willingnes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To promote homestead exi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coordinately managing the urban housing permit and rural homestead permit to prioritize homestead management system,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mestead reform achievement to development dividend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ing farmers' integration ability.

Key words: idle homestead; homestead exit; farmer's willingnes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GL169)。

作者简介: 孟盼盼(1999—), 女, 山东菏泽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E-mail: 17852022269@163.com; 通信作者:

范胜龙(1976—), 男, 福建永定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村土地制度等研究, E-mail: fsl@fafu.edu.cn。

收稿日期: 2022-12-13; 接受日期: 2023-03-07

Foundation item: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1BGL169).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 Sheng-long, E-mail: fsl@fafu.edu.cn.

Received 13 December, 2022; Accepted 7 March, 2023

闲置宅基地退出作为宅基地制度改革最有效的实现形式之一,城乡融合发展为其提供了驱动力。长期以来,我国宅基地制度作为一种福利性分配,具有保障农民住有所居、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政治属性。而城乡融合发展的加速推进,城乡二元体制被打破,农村人口、经济和服务等要素结构发生改变,给现行宅基地管理制度带来了冲击。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得农村人口布局、农户家庭的生计模式发生改变^[1],加剧农村“空心化”,造成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宅基地原始的无偿划分、福利分配的政治属性成为进城农民的最后退路^[2],农户“离乡不弃农、进城不退地”的现象造成农村人口持续负增长与宅基地规模正增长的矛盾突出^[3],此与宅基地制度福利性保障的设计初衷相悖。以上表明城镇化及其带动的社会流动成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推力,宅基地管理工作正在由之前的“按需分配”转变为“有序退出”,而宅基地退出会带来乡村物质空间的整合和地域结构的重构^[4],使城乡关系更趋近于融合发展的要求。因此,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户家庭退出宅基地的影响作用不可忽视,两者间存在良性的循环关系。同时,在农户家庭内部,受生计资本、教育经历等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特征出现巨大的代际差异^[5],老一代农户和新生代农户对宅基地功能需求产生不同的价值认知,退出意愿也伴随代际效应。鉴于此,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研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并辨析不同代际农户对宅基地的选择偏好,对盘活闲置宅基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宅基地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城镇化进程中宅基地的制度改革^[6],权力束的扩张^[7]、耦合乡村振兴^[8]等视角,研究从制度、政策和产权等宏观管理视角上阐释了城镇化对农村宅基地改革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9],学者意识到快速城镇化伴随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人口数量下降,造成农村宅基地管理的主要目标转变为解决农村人口减少背景下的宅基地退出问题^[10],提出城镇化过程与宅基地退出过程存在互促共进的关系,进城落户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11],有学者研究了农村人口流动对农户退出宅基地的促进作用,指出人口流动是宅基地退出与流转的主要推动力量,并进一步意识到农村流动人口特征存在巨大的代际差异^[12],宅基地的价值认知呈现代际上的分异^[13],但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是否具有代际差异性?少有文献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现有成果将城乡融合发展视为抽象化的概念,从宏观维度上解

释其与宅基地退出的内在逻辑,但未明晰其对退出意愿的具体影响表征,缺少将城乡融合量化的实证性分析,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中的代际效应关注力度仍需加强。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城乡融合发展和代际效应理论,利用福建省建瓯市农村 646 份实地调研数据,统计分析农户宅基地退出的概况,采用 Probit 模型和 IV-Probit 模型,识别城乡融合发展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显著性影响因素,辨析不同类型村庄农户退出意愿受城乡融合发展的异质性;并在调节效应模型中引入交互项,验证农户代际在城乡融合发展对退出意愿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相比现有研究,本文不仅纳入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四大要素综合探究城乡融合发展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更进一步估计了代际效应的调节作用,以期从“横向—城乡融合驱动”+“纵向—农户代际差异”的视角为推进宅基地改革进程提供研究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涵盖人口、经济、社会和土地等多种要素融合的综合化发展^[14],其与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了城乡间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中,农户家庭人口、经济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使农户借助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的更多机遇扩大自身收入来源,并平等的享受城市公共管理和各项公共服务,加快农户从农业生产中退出并迁移至城镇^[15],从而实现空间层面上的人口转移和经济层面上的职业转换。熊柴等^[16]指出,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需要推进土地流转,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而这一过程有赖于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收入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因此,本文认为人口、经济融合发展为农户退出宅基地提供了驱动力。

农村社会、土地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使资本、产业等要素不断流入农村,带动了以开发新型农业、农家乐和旅游业为目的的资本流入,从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17],削弱了农户逃离农村的意识,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被弱化。村庄距离中心市县的远近可作为表征城乡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距离城市较近的近郊型村庄发展受城市辐射的影响较大,农户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与城市联系密切,故农户更有可能迁移进城市而退出宅基地;距离城市较远的边远型村庄,因处在城乡结构的边缘位置,村庄发展受城市辐射作用较弱,农

户生计多依赖于农业生产，农业化程度较高，故农户选择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较低。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人口融合、经济融合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而土地融合、社会融合对退出意愿有抑制作用；城乡融合发展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在村庄类型上存在异质性。

1.2 农户代际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调节作用

代际效应是由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提出，该理论认为不同历史代际的个体因处于不同的生长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认知和行为偏好，从而在决策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18]，这种差异被学者定义为代际效应。代际效应带来的不稳定性随着农户分化逐渐显化，为探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代际异质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老一代的生存基础在农村，农业转移的社会参与度不高^[19]，与城市社会的交流甚少，以务农为主

要生计模式，生存技能有限，社会关系网络也局限于农村亲属^[20]，出于自身能力限制和较低的发展需求，老一代农户作为被动的弱势群体往往不会能动地涌入城市化进程中，故对农村、农宅的珍惜和依赖感更强；新生代在生活环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显著差异，其生计模式多来源于城市化进程，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21]，不需要依赖宅基地的“兜底”保障作用^[22]，更倾向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化生计模式，故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农户代际在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具有调节作用，新生代更容易受城乡融合发展作用影响而退出宅基地。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农户代际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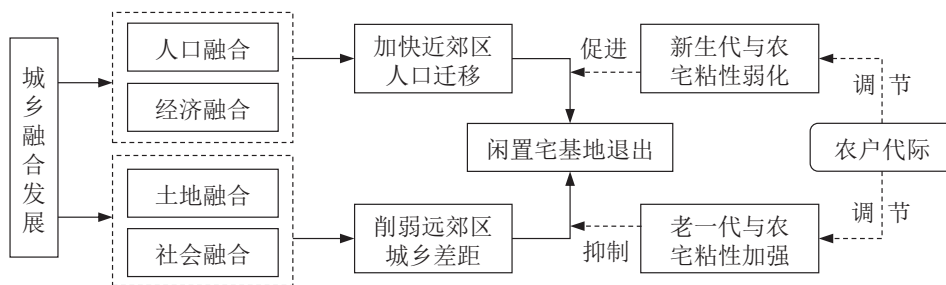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2 年 7 月赴福建省建瓯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调查区域涵盖建瓯市迪口镇、东峰镇等 11 个乡镇。为保证调研的普适性，随机选取包括可建村、井岐村等宅基地改革试点村庄和连地村、太平村等非试点村庄共 18 个村庄作为主要调研区域。实地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每村随机抽取有闲置宅基地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基本情况、宅基地利用情况、政策认知、退出意愿等。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700 份，收回问卷 686 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646 份，有效率达 92.3%。此外，村庄人口数据来源于村委会的统计资料。

之所以选择建瓯市为研究区域，其依据是该市作为福建省面积最大、闽北人口最多的县级市，亦是福建省农业发展大市，被评为第二批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和第三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

生产与城市资本下乡融合发展成果明显，与其他传统农区相比，对研究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外，研究区域宅基地盘活程度较高，根据建瓯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办公室发布的宅基地改革成果季度报告，仅 2022 年第二季度，建瓯市就已累计清退宅基地 3.5 万 m^2 ，通过宅基地整治盘活 7.8 万 m^2 闲置宅基地，极大的拓宽了乡村发展空间。调研区域闲置宅基地改革成效显著，为研究宅基地退出提供了可行性。

2.2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以下简称退出意愿）。宅基地退出政策主要针对“一户多宅”、离农进城等存在多余宅基地的农户，又因调研地点建瓯市为华侨之乡，“叶落归根”的乡土情怀较重，考虑到农户的情感依赖，故本研究只探讨闲置宅基地的退出。同时，宅基地作为农户的重要财产，其退出多数发生在获得补偿的前提下，因此，本研究以“您是否愿意有偿退出闲置宅基地”来衡量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

2) 核心解释变量: 人口融合、经济融合、土地融合和社会融合(表1)。

人口融合。人口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最直观的体现, 目前社会发展阶段的人口融合多表现为资源的单向流出^[23], 一般指农户家庭人口向城市转移, 借鉴李帆和冯虹^[24]对人口城镇化的研究, 本文以劳动力转移度、有无城市住房来考察农户家庭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经济融合。借鉴单卓然和黄亚平^[25]对城乡关系的研究, 以农村非农就业率、劳动力二元收入比、家庭经济类型来考察农户就业、生计与城市融合的程度。

土地融合。参考赵燕^[26]对土地城镇化的研究, 宅基地的非农化利用是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形式, 现有研究表明, 参与承包地流转、宅基地存在经营性收益的农户农业转移程度较高, 农地、宅基地市场化水平也更高。因此, 选择农地二元产值比, 即市场化模式与传统耕种模式的收益比值, 反映农地二元利用结构; 选择经营性用途变量来反映宅基地脱离传统农业化利用模式的程度。

社会融合。借鉴黄永春等^[27]对乡村发展的研究, 本文采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与城市联系频次2个变量来反映农户在公共服务上与城市融合的水平, 其中,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测量采取打

分制, 满分5分, 分数越高表示农户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越满意; 以子女就读地点、文娱支出2个变量来反映农户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与城市融合的程度。

3) 调节变量: 农户代际。鉴于目前对宅基地退出行为研究一般以农户家庭为单位^[28], 而农户家庭内部往往呈现“数代同堂”现象, 考虑到户主对农户家庭决策的主导地位和对子代未来接手农业生产的影响作用, 故以家庭户主的年龄单独划分农户家庭所处的代际位置。借鉴何可和张俊飏^[29]的代际划分方法, 将出生于1975年及以后的户主界定为新生代农户, 1960—1974年出生的界定为中生代农户, 1960年之前出生的界定为老一代农户, 并赋值。

4) 工具变量: 城镇化率和农村常住人口数。考虑到城乡融合发展与宅基地退出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故采用工具变量法消除这一顾虑。借鉴周文等^[30]对城市化的研究, 本文选择建瓯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各乡镇城镇化率、农村常住人口数为工具变量, 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城镇化率、农村常住人口数可以直观反映该地区城镇化水平, 但是与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

5) 控制变量。本文参照蔡俊等^[31]和Erul等^[32]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被解释变量	退出意愿	愿意=1; 不愿意=0	0.658
人口融合	劳动力转移度	家庭成员进城人数/家庭村内常住人口数(人)	0.258
	有无城市住房	是否已或计划(3年内)在市(县)区购房: 是=1; 否=0	0.360
经济融合	农村非农就业率	家庭成员在农村从事非农职业人数/家庭总人数(人)	0.170
	劳动力二元收入比	家庭进城人员收入/乡村从业收入(万元), 对数化处理	2.258
	家庭经济类型	务农=1; 以农为主兼业=2; 以非农为主兼业=3; 非农=4	1.862
土地融合	农地二元产值比	承包地流转收入/承包地自种收入(万元)	0.231
	经营性用途	宅基地是否存在经营性用途: 是=1; 否=0	0.212
社会融合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	宅基地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满意度分值: 1~5	2.664
	与城市联系频次	近一年因通信、金融、医疗等公共事务进城频次, 对数化处理	3.873
	子女就读地点	高中以下子女就读地点: 村内或临近乡镇=1; 县城、市区=0;	0.624
	文娱支出	近一年农户家庭在城市的文娱性花费(万元)	0.371
调节变量	农户代际	新生代=1; 中生代=2; 老一代=3	1.760
工具变量	城镇化率	各乡镇城镇化率	0.136
	农村常住人口数	村庄常住人口数(人), 对数化处理	1.771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 女=0	0.672
	文化程度	未接受过教育=1; 小学=2; 初中=3; 高中/中专=4; 大专/大学及以上=5	2.191
	家庭人口数	≤3人=0; 4~6人=1; >6人=2	1.012
	宅基地数量	农户拥有宅基地的数量	2.211
	是否了解“一户一宅”政策	是=1; 否=0	0.781
	是否了解退出补偿标准	是=1; 否=0	0.352

的研究,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宅基地特征、政策认知维度选取 6 个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2.3 模型设定

1) Probit 模型。由于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否愿意退出闲置宅基地”是一个 0~1 的二元变量,因此,构建 Probit 模型:

$$\text{Prob}(Y_i = 1) = \phi(\alpha_0 + \alpha_1 U_i + \alph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中: Y_i 表示第 i 个农户的退出意愿,愿意退出为 1,不愿意退出为 0; U_i 表示城乡融合发展变量; X_i 为控制变量; α_0 、 α_1 、 α_2 为待估系数, ε_i 为随机扰动项,并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2) 内生性检验。考虑到人口融合与退出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同时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城镇化率、农村常住人口数 2 个工具变量,采用 IV-Probit 模型 Heckman 两步法^[33],对内生性解释变量劳动力转移度进行参数估计。由于所选工具变量的个数大于内生性解释变量的个数,故要同时对模型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3) 调节效应模型。为了考察代际对城乡融合发展变量的调节效应,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户代际的交乘项,得到:

$$\text{Prob}(Y_i = 1) = \phi(\alpha_0 + \alpha_1 U_i + \alpha_2 G_i + \alpha_{12} U_i \times G_i + \alpha_3 X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式中: G_i 为第 i 个农户的代际; $U_i \times G_i$ 为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户代际的交乘项,当 α_{12} 显著时,说明在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农户代际具有调节作用。在分析调节作用时,需要将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2.4 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异质性分析主要针对村庄类型入手,鉴于不同区位村庄受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导致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因此,本研究将全部样本划分为近郊型村庄、远郊型村庄和边远型村庄三种类型进行异质性讨论。在参考朱战辉^[34]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村庄去往最近中心市(县)区所需乘汽车时长来划分村庄区位,通勤时间 <15 min 的村庄定义为近郊型村庄;通勤时间 15~40 min 的村庄定义为远郊型村庄;通勤时间 >40 min 的村庄定义为边远型村庄。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有 425 位农户明确表示愿意退出宅基地,占比达 65.77% (表 2),221 位农户不愿意退出宅基地,表明调研地区农户有偿退出闲置宅基地的意愿较高。在退出原因方面,有 32.27% 和 21.93% 的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是因为家庭成员进城务工和就业、子女教育需要搬到城市,可见,追求城市较好的就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为调研地区农户退出闲置宅基地的主要诱因。此外,调研地区 80% 以上的农户家庭以进城务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除了规模养殖、种植的农业“大户”,以单一务农为生计的纯农户几乎不存在。进一步证实了相比于城市较高的工资水平,农户对传统农业经济的信心不足,其生产、生活的重心逐渐向城市偏移,削弱甚至消除了农村宅基地的保障功能,这为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提供了契机。崔新蕾等^[35]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城市较好的生活、养老、交通、医疗和文化教育条件等是吸引农民进城定居的主要因素。

对比分析不同退出意愿农户群体的异质性可知,愿意退出宅基地的群体中有 67.25% 的农户已经或计划(三年内)购置城市住房,而不愿意退出的农户中该比例仅为 21.33% (表 3)。在收入来源方面,愿意退出群体中,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城市的农户达 54.97%,而不愿意退出的群体中,该比例仅占 21.94%。以上数据表明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与城市融合的水平较高。可见,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农户退出宅基地的驱动力,人口流出和生计模式非农

表 2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xit their homesteads

农户基本情况	分类	样本数(人)	占比(%)
退出意愿	愿意	425	65.77
	不愿意	221	34.23
愿意退出原因	计划或已搬迁至城市	120	18.52
	为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	105	16.26
	就业、子女教育需要进城	142	21.93
	家庭成员进城务工,宅基地长期闲置	208	32.27
	“一户一宅”政策引导	71	11.02

表 3 不同退出意愿下农户特征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under different exit types

农户基本情况	分类	愿意退出农户群体		不愿意退出农户群体	
		样本数 (人)	占比 (%)	样本数 (人)	占比 (%)
是否已或计划购置城市住房	是	434	67.25	138	21.33
	否	212	32.75	508	78.67
进城人员收入比重 (%)	≤ 20	87	13.51	363	56.21
	(20, 50]	204	31.52	141	21.85
	(50, 80]	215	33.23	102	15.84
	>80	140	21.74	40	6.10
农户代际	新生代	303	46.86	69	10.63
	中生代	245	38.04	149	23.08
	老一代	98	15.10	428	66.29

化为其具体表现形式, 此与本文所提出的人口融合发展理论方向一致。从代际维度来看, 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群体中, 46.86% 的农户为新生代, 老一代农户仅占 15.10%, 而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群体中, 老一代农户居多, 该结果说明与新生代相比, 老一代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较弱。本研究进一步调查了有城市收入的农户, 结果显示, 该群体大部分为新生代和中生代农户, 拥有城市住房的农户 80% 以上为新生代。因此, 可以合理推测, 代际能调节农户受城市融合发展影响的程度, 使宅基地退出意愿呈现代际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 追求城市较好的就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为农户退出宅基地的主要诱因, 人口流动和生计非农化为其具体表现形式, 且愿意退出的农户群体与城市融合的水平较高;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代际异质性, 老一代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较弱。因此, 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要明晰农户与城市融合的方向, 重点甄别农户退出意愿的代际差异。

3.2 城乡融合发展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分析

由于 Probit 模型系数无法直观解释, 故对其进行边际化处理。结果显示, 人口融合、经济融合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显著, 且人口融合表现为正向影响; 土地融合、社会融合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控制变量中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是否了解退出补偿标准 3 个变量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显著 (表 4)。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理论。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人口融合能正向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而土地融合、社会融合对退出意愿有负向抑制作用, 经济融合整体上促进了宅基地退出, 其随农户生计对城市的依赖度表现为不同的影响方向。

人口融合中, 劳动力转移度、有无城市住房变量反映了农户家庭成员与城市融合的幅度, 其中,

劳动力转移度, 即农户家庭成员进城人数与村内常住人口之比每增加 1 个单位, 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就增加 13.0%, 有城市住房的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概率比无城市住房的农户高 25.3% (表 4)。此结果表明人口融合极大的促进了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可能的原因是, 长期以来, 宅基地作为农户最基本的生存平台, 为农户提供居住保障, 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 城市的各方面条件都好于乡村, 无论是考虑家庭的未来生活还是孩子的发展前途, 理性的乡村人都会选择进城^[36], 农村宅基地不再是承载居住保障需求的必需品而成了替代品, 重要程度明显降低。有学者预测, 到 203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预计达到 70% 左右, 大约有 10 亿人生活在城市里。因此, 人口融合成为农户退出农村宅基地的导火线。

经济融合中, 根据研究结果, 劳动力二元收入比、家庭经济类型变量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正向相关, 而农村非农就业率与退出意愿负向相关。因此, 可进一步推导, 农户家庭收入对城市的依赖程度极大的影响了闲置宅基地的退出意愿, 收入大部分来自城市的农户与农村粘性较小, 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较大, 反之, 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就越小。吴郁玲等^[37]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 非农化的生计模式更能支撑农户改变生产生活方式, 降低其应对外界扰动和冲击的敏感程度, 进而有效激发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可能的原因是经济融合水平较高的农户, 农户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城市, 生计模式多脱离农业生产, 不用担心宅基地退出会对生计造成威胁, 非农化程度更高, 更具备退出宅基地的经济禀赋。晋洪涛等^[38]的研究指出, 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可以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 增强农户面对风险的信心, 从而推进宅基地退出。因此, 在经济上对农村依赖程度较小的农户, 更有可能退出农村宅基地。

土地融合中，经营性用途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负向相关，存在经营性用途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比无经营性用途的低 17.5%（表 4）。该数据说明土地融合伴生的宅基地市场化经营模式对退出意愿起抑制作用。宅基地独特的区位条件使得农户从事超市、餐馆和诊所等经营性活动有比较优势，可产生较高的经济价值，宅基地退出后此经济价值也随之消失，故农户退出意愿较弱。农地二元产值比对农户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调研发现可能的原因是，调研地区农地流转呈现两极分化现象，交通通达度较高、山地可开发面积大的村庄，如连地村、井岐村等调研村庄，农户普遍将农地流出给承包户种植白笋、茶叶等经济作物，农地规模化经营程度较高；而地块零散的村庄，如中村村、吉阳村等村庄，因农地土壤肥力较差，开垦成本较高，农业生产具有不经济性，故农地抛荒现象严重。总体来看，农户与农地、农业生产间的联系较弱，不足以形成农户退出宅基地的阻力，故农地二元利用模式伴生的农地二元产值比对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影响不显著。

社会融合中，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每提高 1 分，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概率就降低 13.8%；子女在本地就读的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概率比子女在城市就读的农户低 15.2%；文娱支出每增加 1 万元，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概率提高 8.3%（表 4）。可得出，

社会融合发展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抑制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可能的原因是，随着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双向流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标准逐渐向城市看齐，人居环境得到较大幅度改善，子女接受教育、医疗保健、金融业务等基本需求在村内得以满足，降低了农户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农户离农发展的意识被削弱，故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不明显；而在城市文娱消费支出多的农户，更追求城市较高端的文娱活动，如展览馆、娱乐场、游乐园等，而村内无法提供此类服务，故经济条件富裕的农户可能为享受城市高质量的文娱服务而选择离开农村，进而退出宅基地。

3.3 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分析

本文采用 IV-Probit 模型“两步法”进行内生性问题检验。第一阶段检验是剔除掉 Probit 模型中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后，将劳动力转移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与剩余变量作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农村常住人口数 2 个工具变量系数分别为 0.650 和 -0.266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表 4），故认为本研究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可行，与内生性解释变量有较强的相关作用。

第二阶段检验是将退出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第一阶段工具变量产生的拟合值与剩余变量作回归，检验结果与 Probit 回归结果方向一致，进一步

表 4 IV-Probit 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V-Probit model

变量	边际化处理		第一阶段检验		第二阶段检验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转移度	0.130***	0.011			2.756***	0.395
有无城市住房	0.253***	0.019	0.062	0.068	1.249***	0.195
农村非农就业率	-0.097***	0.007	-0.060***	0.023	-0.368***	0.072
劳动力二元收入比	0.297***	0.043	0.012	0.041	1.073***	0.021
家庭经济类型	0.038***	0.013	0.026	0.035	0.229**	0.100
农地二元产值比	0.032	0.050	0.025	0.019	0.060	0.090
经营性用途	-0.175***	0.026	0.131*	0.077	-0.541**	0.224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	-0.138**	0.061	-0.231**	0.103	-0.232***	0.090
与城市联系频次	0.125	0.441	1.007	0.841	0.225	0.509
子女就读地点	-0.152***	0.026	-0.133*	0.074	-0.469**	0.220
文娱支出	0.083**	0.042	1.296	0.804	0.011**	0.050
性别	-0.030	0.024				
文化程度	0.050***	0.014	0.011	0.017	0.062***	0.018
家庭人口数	-0.049***	0.019	0.319***	0.051	-0.955***	0.197
宅基地数量	-0.003	0.026				
是否了解“一户一宅”政策	0.084	0.401				
是否了解退出补偿标准	0.117***	0.023	0.089	0.063	0.432**	0.182
城镇化率			0.650***	0.244		
农村常住人口数			-0.266***	0.039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验证了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显著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人口融合、经济融合极大的促进了农户宅基地退出，而土地融合、社会融合则抑制了农户退出意愿。可能的原因是，城乡融合发展核心是人口的融合发展，经济融合发展是人口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且农业人口向城市涌入的态势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其背后是宅基地原始的居住保障功能变得次要，因此，人口融合、经济融合发展促进了宅基地退出；土地融合、社会融合则显化了宅基地的重要性，资本、产业等要素的不断流入为农村朝着多功能复合化发展提供了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农户的居住幸福感被放大，使他们更不愿离开长久以来生活的“舒适圈”。此外，宅基地作为农村建设用地的组成部分，退出的闲置宅基地能为农村产业发展腾退指标，加快了农村“人一地一业”系统良性循环，故反向抑制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

由于本研究所选的工具变量的数量大于内生解释变量的数量，故要进行过度识别检验，Stata 检验结果显示 Sargan 检验的统计量对应的 P 值为 $0.213 > 0.05$ ，则不拒绝原假设“假设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故认为该模型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了进一步检验所选择的工具变量的准确性，故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表 5）。原模型假设“所选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根据检验结果，Cragg-Donald 统计量 27.48 大于 Stock-Yogo weak ID test critical value 在 10% 水平上的统计值 19.93，拒绝了原假设，即该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本研究模型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故认为该模型是科学和正确的。

表 5 Cragg-Donald 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the Cragg-Donald weak instrumental variable test

检验类型	统计量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28.56
Kleibergen-Paap Wald F statistic	27.48
Stock-Yogo weak ID test critical values:	
10% maximal IV size	19.93
15% maximal IV size	11.59
20% maximal IV size	8.75
25% maximal IV size	7.25

3.4 村庄异质性分析

村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城乡融合发展只对近郊型村庄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有全部正向影响，且人口融合的影响最强；土地融合、社会融合极大的抑制了边远型农户的退出意愿（表 6）。以上结果表明，地理区位作为农户与城市融合的重要媒介，影响着城市化对农户的辐射程度，从而使农户退出意愿在村庄维度上具有异质性。

进一步分析异质性原因。近郊型村庄与中心市（县）区距离较近，农户可以就近享受城市良好的就业、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更具备与城市紧密互动的便利条件和进城落户的区位优势，易实现城市融入和职业上的非农化，故人口融合和经济融合为农户退出宅基地提供了契机；远郊型村庄农户一方面借助城镇化发展提供的更多机遇扩大自身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仍需兼顾农业生产，农工兼顾的生计模式使得远郊型农户在退出宅基地中受到城乡双重阻力的制衡，同时，多数农民工仍处于“半城镇化”的状态，生计模式未完全“非农化”，导致农户尚不能完全放弃农村宅基地。因此，生产重心向城市还是农村倾斜是决定远郊型村庄农户宅基地退

表 6 异质性分析检验结果

Table 6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近郊型村庄		远郊型村庄		边远型村庄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转移度	0.281***	0.072	0.060	0.110	0.053	0.112
有无城市住房	0.314***	0.011	0.025*	0.013	0.038**	0.019
农村非农就业率	0.204	0.180	-0.025***	0.007	-0.109***	0.024
劳动力二元收入比	0.305***	0.059	0.143**	0.064	0.157**	0.070
家庭经济类型	0.051	0.039	0.042**	0.017	0.062	0.203
经营性用途	-0.009	0.011	0.114	0.150	-0.023***	0.008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	0.013	0.026	0.011	0.021	-0.278***	0.024
子女就读地点	0.021	0.047	0.040	0.026	-0.154**	0.062
文娱支出	-0.088	0.060	-0.059**	0.023	-0.377	0.705

注：根据上一节回归结果，“农地二元产值比”、“与城市联系频次”为不显著变量，故作剔除处理，未包含在此模型中（下同）；为节省篇幅，表中未报告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回归结果（下同）。

出的关键，故经济融合大幅影响了其退出意愿；边远型村庄农户因距离中心市区较远，通勤不便，不具备就近享受城市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区位优势，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发展，国家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村环境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户与农村之间的粘性，故社会融合水平的提高将大大削弱边远型农户离开农村发展的意识，降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3.5 农户代际在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调节作用分析

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户与人口融合的交乘项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 7）；中生代与经济融合的交乘项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显著性水平大于有无城市住房、文娱支出的交乘项；老一代与土地融合、社会融合的交乘项显著且系数为负，显著性水平大于农村非农就业率的交乘项。此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预期方向一致，表明农户代际在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中具有调节作用，新生代、中生代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受人口、

经济融合发展的影响显著，而老一代的退出意愿受土地融合、社会融合发展的影响显著。这证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新生代更容易发生人口迁移和职业转变，从而松动与农宅间的粘性，成为宅基地退出的主力军。

进一步分析农户代际的调节效应。受年龄、文化水平、宅基地价值认知等影响，新生代更倾向于流入城市，同时在年龄、能力上具有更好的禀赋优势应对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故更容易搭上城镇化发展的“顺风车”；中生代的退出意愿则取决于其生计模式向城市倾斜的程度，收入来源较依赖城市的农户退出意愿更明显；而老一代农户往往收入不高、社会保障不健全，该部分农户生存基础在农村，往往将农村当作最终归宿，农村宅基地为其养老生活的保底，故宅基地退出意愿较低。因此，与生存技能单一、接受新生事物能力较弱、对宅基地保留需求较大的老一代农户相比，新生、中生代更容易受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迁移至城镇，从而退出农村宅基地。

表 7 农户代际的调节作用检验

Table 7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rmers' generations

变量	× 新生代		× 中生代		× 老一代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劳动力转移度	0.308***	0.071	0.008	0.016	0.201	0.163
有无城市住房	0.118***	0.008	0.036*	0.021	-0.189	0.202
农村非农就业率	-0.157	0.500	-0.106***	0.008	-0.221**	0.102
劳动力二元收入比	0.273	0.707	0.446***	0.013	-0.177	0.602
家庭经济类型	0.195**	0.085	0.311***	0.033	0.176*	0.104
经营性用途	-0.070	0.045	0.268	0.203	-0.153***	0.042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	0.062	0.077	0.039	0.076	-0.116***	0.038
子女就读地点	0.239	0.702	-0.110	0.095	-0.225***	0.024
文娱支出	1.265	0.777	0.032*	0.019	0.027	0.054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福建省建瓯市农户自愿有偿退出闲置宅基地的意愿明显，追求城市较好的就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为农户退出宅基地的主要诱因。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四个维度对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均有显著性影响。村庄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融合对近郊型农户退出宅基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区位优势伴生的与城市互动的便利条件是近郊型农户退出的主要驱动力。代际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农户代际可改变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方向从而调节宅基地退出意愿。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本质是改变农户和农宅之间的粘性，而农户生产、生活的重心是否发生转移是影响其粘性改变的关键，因此要重点关注经济融合对农户带来的影响，甄别农村非农就业率对宅基地退出的阻碍作用。对代际的研究结果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青年、老年农户的发展特点和差异性，中青年农户群体作为城镇化的主流，构成了闲置宅基地退出的主力军，老年农户与城市融合的能力较弱，更容易将农村视为最终归宿，宅基地则是其生活的保底。因此，宅基地管理工作应统筹农户的城乡发展水平，重点甄别宅基地对农户来说是“退路和保底”还是“资源的冗余”，深化宅基地制度设计的保障性初衷，勿以退出作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唯一的贯彻

行径。

需要指出的是,宅基地退出是个复杂的动态化系统,本文从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维度表征城乡融合发展,证实了城乡融合发展影响退出意愿的理论假说,为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宅基地管理提供了思路,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基于农户家庭微观视角,从城市和乡村两个维度构建面板数据,探究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动态影响机制,是下一步要考虑的研究方向。

4.2 政策启示

1) 加强城乡统筹联动,优化宅基地退出制度。城镇化是闲置宅基地退出的主要诱因,因此宅基地退出工作应重点针对进城农民群体,联立城市住房指标与农村宅基地指标统筹管理制度,统筹城市落户与农村户籍制度一体化管理,以城市落户身份资格和保有宅基地的权利不得兼顾对农户进行约束,使进城落户的农户释放农村多余宅基地资源。

2) 因地制宜推进宅基地退出政策,推动宅基地改革成果转化为发展红利和治理实效。地理区位是农户与城市融合的重要媒介,因此,引导城市人口、资本流入应立足乡村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鼓励近郊型村庄利用闲置宅基地发展乡村旅游、民宿和文化创意等多元产业,以激活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推动宅基地改革成果转化为乡村发展红利;边远型村庄应重点将闲置宅基地盘活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相结合,推动闲置宅基地复垦复绿、退宅还耕,助力宅基地改革成果转化为乡村治理实效。

3) 提高农户城市融入的能力,保护农户宅基地资格权。针对城乡两栖的青年农户群体,宅基地的保障作用是影响其退出的关键。因此,应降低农户城市融入的门槛,通过开展就业培训、增加城市非农就业机会等提高农户城市融入的能力,从根源上解决农户因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而保留宅基地的保障顾虑;同时要推进以保护农户未来返乡资格权为核心的“地票”“宅票”制度,加强以“时间”换“空间”的闲置宅基地盘活路径探索。

参考文献:

- [1] 祁伟彦,王玉庭,李哲敏.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2): 194-202.
Qi W Y, Wang Y T, Li Z M. Impact of homestead withdrawal on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A case study of Xuzhou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1, 42(12): 194-202.
- [2] 贺雪峰. 宅基地、乡村振兴与城市化[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4): 1-8.

- He X F. Homestea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1(4): 1-8.
- [3] 高强,宋洪远.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4): 74-84, 158.
Gao Q, Song H Y. Study on the exit mechanism of contractual right of rural lands[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17(4): 74-84, 158.
- [4] 张英男,龙花楼,马历,等. 城乡关系研究进展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J]. 地理研究, 2019, 38(3): 578-594.
Zhang Y N, Long H L, Ma L,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578-594.
- [5] 陆铭,贾宁,郑怡林. 有效利用农村宅基地——基于山西省吕梁市调研的理论和政策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4): 13-24.
Lu M, Jia N, Zheng Y L. For efficient use of rural homesteads: A theoretical and policy analysis based on cases from Lvliang, Shanxi[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4): 13-24.
- [6] 吕萍,林馨. 从农民住房权益视角审视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制度[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2): 221-230.
Lü P, Lin X. Study on the rural homestead and hous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housing right[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2): 221-230.
- [7] Lewicka M.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 31(3): 207-230.
- [8] 张勇,周婕,陆萍. 乡村振兴视阈下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安徽省两个案例的考察[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4): 96-106.
Zhang Y, Zhou J, Lu P. Theory and practice on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wo cases in Anhui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4): 96-106.
- [9] Zhou T, Jiang G H, Zhang R J, et al. Addressing the rural in situ urbanization (RISU)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mechanism[J]. Cities, 2018, 75: 59-71.
- [10] 桂华. 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思路探析[J]. 人民论坛, 2021(16): 68-71.
Gui H.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ideas of reforming the rural residential base system[J]. People's Tribune, 2021(16): 68-71.
- [11] 杨青贵. 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权益保护的现实表达与法治回应[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5(3): 147-157.
Yang Q G. The real expression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 of protection of homestead's rights and interests for peasants settled in city[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25(3): 147-157.
- [12] 邝佛缘,陈美球. 风险预期、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江西省456份农户调查数据[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20(1): 92-101.
Kuang F Y, Chen M Q. Influence of risk expectation and livelihood capital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homestead and it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456 households in Jiangxi Province[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1, 20(1): 92-101.

- [13] Long H L, Zou J, Pykett J, et al. 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J].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3): 1094-1105.
- [14] 廖文梅, 袁若兰, 虞娟娟.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研究——基于江西省脱贫县(市)的数据[J]. *生态经济*, 2022, 38(11): 115-121, 129.
Liao W M, Yuan R L, Yu J J. Cooperative rel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poverty alleviated counties in Jiangxi Province[J]. *Ecological Economy*, 2022, 38(11): 115-121, 129.
- [15] Liang Z, Ma Z.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2000 censu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4, 30(3): 467-488.
- [16] 熊柴, 蔡继明, 刘媛. 城乡融合发展与土地制度改革[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1, 12(5): 107-138.
Xiong C, Cai J M, Liu 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land system reform[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1, 12(5): 107-138.
- [17]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37-1849.
Long H L, Zhang Y N, Tu S S.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37-1849.
- [18] 曾鹏, 向丽. 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代际差异研究——城市融入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2): 91-99.
Zeng P, Xiang L. Study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population nearby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 37(2): 91-99.
- [19] 陈延秋, 金晓彤. 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J]. *青年研究*, 2016(1): 30-38, 95.
Chen Y Q, Jin X T.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J]. *Youth Studies*, 2016(1): 30-38, 95.
- [20] Araujo C, De Janvry A, Sadoulet E. Peer effects in employment: Result from Mexico's poor rural communities[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Working Paper, 2004.
- [21] 杨慧琳, 袁凯华, 陈银蓉, 等. 农户分化、代际差异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宅基地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J]. *资源科学*, 2020, 42(9): 1680-1691.
Yang H L, Yuan K H, Chen Y R, et al. Effect of farmer differentiation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exit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based on the cognition of the homestead value[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9): 1680-1691.
- [22] 郭君平, 仲鹭勃, 曲颂, 等. 抑减还是诱致: 宅基地确权对农村违法占地建房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5): 72-88.
Guo J P, Zhong L Q, Qu S, et al. Reduction or inducement? The impacts of rural homestead rights confirmation on illegal land occupation and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2(5): 72-88.
- [23] 游斌, 张军涛, 于婷. 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研究[J]. *江汉学术*, 2021, 40(6): 13-22.
You B, Zhang J T, Yu T. Research on the realization form of “Three Rights Divis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J]. *Jiangnan Academic*, 2021, 40(6): 13-22.
- [24] 李帆, 冯虹. 土地资源禀赋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1, 42(3): 441-450.
Li F, Feng H. The impacts of land resource endowment o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settle down in citie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1, 42(3): 441-450.
- [25] 单卓然, 黄亚平.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2): 16-22.
Shan Z R, Huang Y P. An analysis of concept, goals, contents,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of new urbanizat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2): 16-22.
- [26] 赵燕. 要素配置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土地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2, 38(11): 22-41.
Zhao Y. Does factor allocatio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land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J].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2, 38(11): 22-41.
- [27] 黄永春, 宫尚俊, 邹晨, 等.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 32(10): 77-87.
Huang Y C, Gong S J, Zou C, et al. Digital economy,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2(10): 77-87.
- [28] Scannell L, Gifford R.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0.
- [29] 何可, 张俊飏.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生态价值——基于新生代农民与上一代农民支付意愿的比较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5): 62-73, 85.
He K, Zhang J B.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re-use of agricultural was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willingness to pay of new generation farmers and old generation farmer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4(5): 62-73, 85.
- [30] 周文, 赵方, 杨飞, 等. 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 理论与模拟[J]. *经济研究*, 2017, 52(6): 183-197.
Zhou W, Zhao F, Yang F, et al. Land transfer,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oretical and simulation tes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7, 52(6): 183-197.
- [31] 蔡俊, 章磊, 袁宏伟, 等. 基于改进 TAM 框架的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资源科学*, 2022, 44(5): 899-912.
Cai J, Zhang L, Yuan H W, et 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homestead withdrawal behavior intention based on improved TAM framework[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5): 899-912.
- [32] Erul E, Woosnam K M, McIntosh W A. Considering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explain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 support tourism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0, 28(8): 1-16.
- [33] 袁微. 二值选择模型内生性检验方法、步骤及 Stata 应用[J]. *统计与决策*, 2018, 34(6): 15-20.
Yuan W. Endogenous test methods, procedures and Stata applications of binary selection model[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18, 34(6): 15-20.
- [34] 朱战辉. 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J]. *云南民族*

-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9(2): 112-119.
- Zhu Z H.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differentiation[J].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39(2): 112-119.
- [35] 崔新蕾, 吴丽娜, 刘欢. 迁居补偿、生计转型能力与城镇化意愿——基于民族地区农牧交错区实证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2): 122-130.
- Cui X L, Wu L N, Liu H. Relocation compensation,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bility and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agro-pastoral ecotone in ethnic areas[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2, 43(2): 122-130.
- [36] 吴业苗. 乡村转型及其路向: 基于“人的城镇化”发展逻辑[J]. 人文杂志, 2017(8): 116-124.
- Wu Y 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way forward: Development logic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17(8): 116-124.
- [37] 吴郁玲, 谢锐莹, 于亿亿. 生计恢复力、价值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响应的影响[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2(2): 69-78.
- Wu Y L, Xie R Y, Yu Y Y. Effect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value cognition on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2(2): 69-78.
- [38] 晋洪涛, 刘巧娜, 史清华. 风险感知、风险态度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以河北省唐山市郊区农户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1): 65-76.
- Jin H T, Liu Q N, Shi Q H. Research on risk perception, risk attitude, and rural households' withdrawal willingness of homestead: A case study of suburban farmers in Tangshan City, Hebei Provinc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1): 65-76.

(责任编辑: 童成立)